

从各个领域研究毛泽东思想

# 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演变的几个阶段

祝 彦

(中共中央党校 党史部, 北京 100091)

〔摘要〕 本文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出发, 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演变的几个阶段进行了梳理论述。使人们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形成与确立、及其变化过程有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 并通过这种分析, 认识到正确的思想路线的确立, 是来之不易的, 使人们认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全面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关键词〕 毛泽东思想; 历史地位; 演变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8999 (2007) 01 - 0013 - 04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的演变。在土地革命时期曾被贬为“农民意识”、“狭隘的地方观念”、“枪杆子主义”而受到歧视, 作为思想的主要提出者毛泽东本人则受到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的排挤和打击; 延安时期党的七大上, 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基于党情国情, 党的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 之后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宣传毛泽东思想; 但到 1958 年以后由于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推波助澜, 而出现了“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全党思想路线得到拨乱反正, 否定了“两个凡是”, 科学地全面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 (一)

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是毛泽东思想萌芽、初步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里, 由于“左”倾错误在党内占统治地位, 毛泽东思想受到打击、压制, 作为思想的主要提出者毛泽东则被讽刺为“右倾保守主义”和“农民意识”而遭受歧视, 并被排挤出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层。

由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没有去攻打长沙, 而是往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进军, 于是在 1927 年 9 月由共产国际代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被批评为“临阵脱逃”。在同年 11 月,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决议, 取消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sup>〔1〕</sup>作为对“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实践, 毛泽东却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打击。此后由于“左”倾教条主义一直占据党内统治地位,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思想长期受到压制。

对于这段遭遇, 毛泽东在 1956 年 9 月 10 日一次讲话中作了回顾: “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 没有选举权。……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 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 赶出红军等, 有多少次呢? 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你说开除了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 我就不相信, 我就不高兴。……后头又说这是谣传, 是开除出政治局, 不是开除党籍。啊呀,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sup>〔2〕</sup>

可以这么说, 毛泽东思想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 这一时期受到了错误思想的严重排挤和打击。但是历史恰恰证明,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民主革命的任务及策略等思想是正确的。由是, 我们总结认为, 毛泽东

〔收稿日期〕 2006 - 09 - 28

〔作者简介〕 祝 彦 (1964 - ), 男, 江西省新干县人,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毛泽东思想教研室副主任, 历史学博士, 全国毛泽东 (哲学) 思想研究会副秘书长。

思想在形成过程中经历的挫折,恰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特点,即是在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逆境中成长起来的。

## (二)

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使全党同志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指导的重要意义。因此随着全党对中国革命问题思考的逐渐成熟,人们开始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重要性。于是党内开始有同志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予以阐述。1942年张如心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首次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3年7月8日王稼祥第一次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45年刘少奇在《论党》中则作了具体的论述,该文指出: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sup>[3]</sup>顺应党内的一致要求,党的七大党章中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方针。”由此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思想地位得以确立。

为什么“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会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呢?有学者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有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即那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树立自己的话语权威,来应对国际国内党内党外的形势。1943年,由于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需要一位思想意识上的领头人,一则是对国际形势的回应,因为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国需要一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应付这种时局;一则与国内出版了《中国之命运》的蒋介石相抗衡,这在政治上表现为谁是以后中国的合法性领导者的核心问题。在思想上则表现为谁能建立一套意识形态的体系来设定中国的走向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言说则表现为谁能建立一套话语方式来规范中国人的言说方式和行为姿态。因此,战争中的时势呼唤延安话语权威的诞生。谁能担承?就当时的情形看来,当然是非毛泽东莫属。”<sup>[4]</sup>

作为党内当时对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起着重要作用的刘少奇在“文革”中对其子女说:“七大提毛泽东思想有三条原因:(1)解放区分散,不能群龙无首;(2)为了反击蒋介石一个民族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论调;(3)为了抵制第三国际教条主义指挥,根据实际情况,当时毛泽东同志水平最高,贡献最大,应该提毛泽东思想。”<sup>[5]</sup>胡乔木的回忆补充论证了以上观点,他说:七大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共产党影响始终没有断。<sup>[6]</sup>

这里,笔者以为,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还有一个很坚实的群众基础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的威信大增。诗人陈学昭的诗歌表达了这种普遍存在于干部群众心中的爱戴之情:“共产党的英明领袖毛泽东,中国革命的道理顶精通。他理论联系实际宗宗好。他政治军事样样通。他文的武的都能行。他实事求是好作风。……”<sup>[7]</sup>传唱一时的民歌则表达了基层群众对毛泽东的崇敬心情:“太阳升,东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sup>[8]</sup>

随着指导地位的确立,很快形成了这一时期宣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并体现了其历史特点,即在真心实意地宣传作为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的优良品质的同时,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sup>[9]</sup>

## (三)

尽管共产国际于1943年解散了,但作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榜样的前苏联仍然对中国共产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因此中共党内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自然希望得到“老大哥”的认可与支持。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苏共中央拒不承认。据胡乔木回忆说:“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sup>[10]</sup>鉴于苏共的这种反映,1949年1月毛泽东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草案时将其中“毛泽东思想”一词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此后,毛泽东本人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上采取了低调态度。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要求:“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sup>[11]</sup>他提议将“毛泽东思想”,代之以“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提法。<sup>[12]</sup>

建国前后及建国后一段时期内,中共党内和毛泽东个人对宣传“毛泽东思想”持低调,并在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一词,这是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缘由的:

第一,为了维护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大局。1954年12月19日在与民主党派人士座谈时,毛泽东解释说:“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sup>[13]</sup>无疑,不提毛泽东思想,其目的是,以免给苏共一个中共在“另竖一帜”的印象,从而影响两党关系,并影响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中国共产党正是出于维护团结的大局,主动不提毛泽东思想。

第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少经验,需要进行理论探索与总结。“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子女责问他为什么在八大上不提毛泽东思想时,刘少奇平静地回答道:“八大不提,因为当时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方针政策还

有待于实践检验，还不成科学体系。因此经中央讨论毛泽东同志同意，八大党章上没写毛泽东思想。<sup>〔14〕</sup>

第三，警惕党内出现个人崇拜。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践踏民主与法制的错误，引起中共的警醒。吸取斯大林的教训，中共更加注意“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sup>〔15〕</sup>因此，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也强调：必须从制度上防止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要继续坚决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第四，党内谦虚谨慎的作风。应该说建国前后，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对自己夺取全国胜利是很珍惜的，“进京赶考”的心情是既兴奋又惴惴不安的。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表达了这种复杂的心情：“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sup>〔16〕</sup>因此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的口号。也因此对于一些地方歌功颂德的做法，毛泽东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比如，1950年5月20日和10月27日，毛泽东分别在沈阳和北京两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在市中心和天安门前铸毛泽东铜像的报告上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只有讽刺意义”，“不要这样做”。<sup>〔17〕</sup>1956年9月15日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致开幕词，以极其真诚的语言表示：“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sup>〔18〕</sup>对于胜利的珍惜，使党内和毛泽东本人在这一时期内保持了高度的谦虚与谨慎，对于可能助长个人崇拜的现象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由是，在八大召开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书籍中基本上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一词。

#### (四)

但是一年后的1958年，“毛泽东思想”一词又重新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在北京大学庆祝建党37周年大会上，陈伯达几次提到“毛泽东思想”；1960年1月16日《红旗》杂志第二期刊登了一篇《学习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扬自觉的能动性》的文章；1960年9月14日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号召全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林彪的提议在得到肯定和批准后，以中央名义发至全国。于是出现了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造势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中走入形式主义和庸俗主义化。

这个时候之所以重新出现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并进入声势浩大的造势，除了有林彪等的别有用心之外，从国际环境看，重新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作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这主要是针对苏联共产党，因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和斯大林长期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歧见，出于维护苏联“国家利益”和苏共权威的需要，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甚至新中国建立后，苏共一直对中共党内事务进行过不恰当的干预，这不仅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造成了挫折，而且最终影响了两党的关系。在很多问题上，中共对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很不满意，不愿意随着他们的指挥棒走。

从国内来看，针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无情否定而导致的政治影响，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召开的会议上，对“个人崇拜”作了新的解释，他说：“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sup>〔19〕</sup>这段对“个人崇拜”分析的话，严格讲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两种“个人崇拜”并不好区别，其“结果是鼓励和助长了不加分析的、盲目服从的个人崇拜。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一点”。<sup>〔20〕</sup>

由于对“个人崇拜”不科学的倡导，这就给林彪、“四人帮”搞个人迷信、歪曲和割裂毛泽东思想留下可乘之机。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时，往往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把“个人崇拜”等同于维护领导威信，以致在现实中出现了“大树特树”，甚至很庸俗化的现象出现。比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主席著作真正好，字字句句都是宝”。出版《毛主席语录》达50余亿册，当时全世界人口约30多亿，平均每人1.5册多，成为名副其实“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和“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sup>〔21〕</sup>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活用毛主席语录，例如老太太上街买菜，要对售货员说：“‘节约闹革命’，请给我2斤菠菜。”售货员则回答：“‘为人民服务’，这是找你的钱。”如果不这样，你就买不到东西。<sup>〔22〕</sup>

在这一时期，林彪、康生、“四人帮”等还利用宣传毛泽东思想，居心叵测地鼓吹“顶峰论”。1958年夏康生在给北京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师作报告时鼓吹道：“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顶峰，世界上没有谁能超过他的水平。”<sup>〔23〕</sup>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林彪更加肆无忌惮地鼓吹“顶峰论”，他说：“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sup>〔24〕</sup>至此，毛泽东思想陷入庸俗化的泥潭。

#### (五)

对于林彪、“四人帮”等大搞个人迷信，把毛泽东思想进行庸俗化宣传的做法，党内许多有识之士深恶痛绝，进行了抵制和反对。在1961年4月的一次军委会上，罗荣桓指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

病。”<sup>[25]</sup>邓小平也尖锐地指出：“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对于在宣传毛泽东思想过程中助长起来的个人崇拜，邓小平也明确指出，“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sup>[26]</sup>他还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sup>[27]</sup>

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口号下，继续维护个人崇拜，提出“两个凡是”，即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其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党内一大批同志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与抵制。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sup>[28]</sup>1977年7月21日，复出后不久的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式上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关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得到党内一大批同志和理论界的积极支持，掀起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跳出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中共中央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了科学的评价，使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了完整、科学的认识。此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研究沿着科学的轨道蓬勃展开。

#### 【参考文献】

- [1] 许全兴. 为毛泽东辩护 [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18.
- [2] 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J]. 党的文献，1991，(3).
- [3] 刘少奇选集：上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34.
- [4] 毛泽东话语权威是怎样确立的？[J]. 书屋，2004，(4).
- [5] [14] 中央党校. 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专题讲座 [C].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 420，420.
- [6] [1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11.
- [7] 解放日报. 1943 - 07 - 18.
- [8] 解放日报. 1944 - 03 - 11.
- [9] [12] [22] [23] 胡为雄. 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略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148 - 149，211 - 212，171.
-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563.
- [13] 毛泽东文集：第6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87.
- [15] 人民日报，1956 - 04 - 05.
- [16] 毛泽东选集：第4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80.
-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362，621.
- [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04.
- [19]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R]. 1958 - 03 - 10.
- [20] 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传（1949 - 1976）：上卷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793.
- [21] 韦梅雄. 毛主席语录编发全程寻踪 [J]. 炎黄春秋，1993，增刊.
- [24] 人民日报，1966 - 01 - 25.
- [25] 罗荣桓传 [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590.
- [26] 邓小平文选：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84.
- [27] [28] 邓小平文选：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45，39.

（责任编辑：杨先农）